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 晏奎 孟凡君 孙继成译 沈弘 李宪堂 审校

#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

——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

A Yankee on The Yangtze  
Be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Shanghai through The  
Central Kingdom to Burma

#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 晏 奎 孟凡君 孙继成译 沈 弘 李宪堂 审校

A Yankee on The Yangtze  
Be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Shanghai through The  
Central Kingdom to Burma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  
(美)盖洛著；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济南：山东  
画报出版社，2008.2

ISBN 978 - 7 - 80713 - 229 - 5

I. 扬… II. ①盖…②晏…③孟…④孙… III. 长江 -  
游记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5992 号

策划编辑 傅光中

责任编辑 秦超

美术编辑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mailto:hbcb@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格 148 × 210 毫米

10.5 印张 2 插页 118 幅图 22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威廉·埃德加·盖洛 (William Edgar Geil), 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865 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顿城。盖洛受过严格系统的地理学专业训练, 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1903 年他首次来到中国, 从上海乘船溯流而上, 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 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 一书, 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此后, 他又数次来中国考察, 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 连续出版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 和《中国五岳》(1926) 等一系列著作。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奈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A  
YANKEE ON THE  
YANGTZE

BE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SHANGHAI  
THROUGH THE CENTRAL KINGDOM TO BURMA

BY  
WILLIAM EDGAR GEIL

WITH ONE HUNDRED FULL-PAGE ILLUSTRATION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27 PATERNOSTER ROW  
MCMIV

#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尔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

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5年5月

#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20世纪初 W. E. 盖洛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系统考察

W. E. 盖洛 (William Edgar Geil) 是20世纪初在西方颇负盛名的美国旅行家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65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顿城。1890年从拉斐特学院毕业之后曾当过几年宣讲福音书的传道师。但在他心中一直蕴藏着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于是在1896年,他请了长假,从纽约登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从此开始了他的全球旅行生涯。在此后30年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非洲、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正如士兵战死于疆场,学者辞世于书房,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最终也是在一次重返圣城的旅程后病逝于威尼斯城。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中,盖洛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3年首次途经日本来到中国,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包括云南地区)的人文地理,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以后,中国成了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他又数次前来中国考察华夏神州,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连续出版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和《中国五岳》(1926)等一系列重量级的著作。<sup>①</sup>

---

\* 这篇文章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上。稍作修改之后在此转载,作为盖洛中国人文地理系列图书的前言。

① 在考察了长江流域之后,盖洛曾经想溯黄河而上全程考察黄河流域,终因黄河上游水道过于凶险无法通航而作罢。

在历史的长河中，写过中国的西方作家堪称数以千计，我们为什么偏要挑中盖洛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独特价值。在其一生中，盖洛曾享有许多头衔和美誉：首先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出版过13部著作，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演讲稿、报刊文章和信札；早在1905年，他就已被誉为“在世最伟大的旅行家”，见识过了五大洲四大洋；他同时也被称做“伟大的演说家”，在世界各地作过几千场演说，听众达数百万之多。在其传记中，作者总是称他为大字书写的“探险家”（the Explorer）。丁韪良在为《中国十八省府》所撰写的序言中，也将这位探访过非洲原始森林和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的探险家跟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相提并论。然而，盖洛有关中国的那四本书中最吸引我们的并非是那些华丽雄辩的文字，或是吊人胃口的历险故事情节，而是作者用照片、文字、图片、地图、谚语等一系列手段详细记录的20世纪初中国精确真实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和现状。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士，盖洛所选择考察中国的角度是独特而具有前瞻性的。他是早期系统考察长江流域人文地理的少数西方人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中国十八行省首府和五大名山的人文地理学家。迄今为止，我们仍没有发现国内外曾经有过如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传统和现代人人文地理的第二人。他在考察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各地的方志和当时已有的科技手段和摄影技术等，仅上述四本书中他就附录了精选的四百多幅照片作为插图，其中包括了长城所有烽火台和1909年中国18个省府的历史照片。光是这些老照片本身，如今就已成为研究中国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的无价之宝。



由西方人来写中国，其难度可想而知。在1842年中国的门户被迫对西方开放之前，能够进入内地的外国人可谓凤毛麟角。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与民族之间方言繁杂，况且当时盗匪出没，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即使在门户开放之后，西方人要真正能够做到周游神州大地，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些还不能算是阻碍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真正障碍。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西方人相去甚远，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东西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要想打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又谈何容易！故而，在盖洛之前虽然也有相当数量有关中国的游记和论著问世，但是真正能够准确把握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客观反映神州大地人文地理全貌的著作可谓屈指可数。绝大部分作者往往受到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局限，要么钻到故纸堆里，靠第二手的材料来编织这个东方古国的神话；要么凭借自己对中国的浮光掠影的印象和即兴的想象发挥，来描述一个不甚准确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形象，颇有点坐井观天的意味。例如任职为奇齐克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的英国植物学家福均（Robert Fortune）自1843年起曾四次来华调查中国茶叶的生产、栽培和制作的情况，并先后出版了至少五部有关中国的游记。其中第一部书名为《华北诸省漫记》，可是茶叶怎么会跟华北诸省有关呢？假如你有兴致耐心读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儿所说的“华北诸省”原来不是指河南、河北或山东、山西，实际上是指江苏、浙江和福建等产茶的省份。

早在19世纪初，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 就已经发现, 在有关中国的早期论著中所描述的情况和他所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和距离。在其于1832年创刊并主编的《中国丛刊》首期发刊词中, 他就大声疾呼, 要以该刊物为平台, 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裨治文认为, 关键是要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的田野调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 西方作者应给予中文典籍和方志以足够的重视, 因为那里面包含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信息; 另一方面, 还必须以实证的精神, 对中国的地理、气候、矿产、农业、渔业、商业、宗教和社会结构等做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无论多么微小的细节都不能忽视, 都要认真加以记录, 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西方人准确地了解这个古老帝国的状态和特点。

虽然盖洛与裨治文的年龄相差半个世纪, 但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新英格兰新教背景和“美国人”典型的实证精神。在撰写其四部有关中国的论著期间, 盖洛不仅大量收集和(借助翻译) 阅读中文的典籍和方志, 而且矢志不渝地坚持在描述某一地方或事物时必须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原则。即使是在回顾历史事件时, 也尽量设法借助摄影技术和历史图片、地图和拓片等手段, 帮助读者回到事件现场。在考察长江流域时, 他冒着生命危险, 在语言不通、不得不借助当地苦力和向导的情况下, 独自深入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写《中国长城》时, 他带着一支精干的考察队, 从山海关一口气走到了西藏境内, 沿途采风, 记录下了有关长城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原本大家都以为长城的最西端为嘉峪关, 但盖洛在实地考察时却发现在嘉峪关西南的西宁或西藏境内, 仍然有连绵不断的城墙向西延续, 而这些残存的城墙在当时的地图上并未标明, 就连西宁的地方志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在考察了长城之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中国18个行省的首府和京师, 每

到一处，必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文人学者（为此目的，他专门在上海定制了200张中国式样的名片），收集典籍方志，参观名胜古迹，采集民风民情。他为最后一本书来华实地考察时已经54岁，身体也比较虚弱，然而他仍然在妻子的陪伴下，坚持一座又一座地攀登了中国的五大名山，亲自考察当地的民俗和道教信仰，并用相机来记录了有关历史。这种为追求理想而不惜“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坚毅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盖洛这四本书中所包含的近五百张老照片、图片、拓片和地图<sup>①</sup>加在一起，展现了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时期中国文化、民俗、社会各界人物和地理风景的独特历史画面。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这些老照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时代感。照片的内容包括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每一个行省首府（包括京师）和众多其他城镇及乡村的建筑，包括街道、城墙、城门、庙宇、农舍、贡院、学校、官府、衙门，以及小桥流水、江河湖海、名山大川、悬崖峭壁、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滩等自然景色。除了总督、巡抚、外国传教士、社会名流、钱庄老板、少数民族之外，就连街头的小吃摊、茶馆、店铺、鸦片馆、剃头挑子、小贩、工匠、乞丐、苦力、独轮车夫、江湖郎中、朝圣香客、算命先生、妓女、赌博摊子、花轿、婚葬行列，以及衙门里的公堂提审、寺庙里的和尚道士、乡间的水车和放牛娃也都进入了盖洛的镜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如今这些画面里的许多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它们成为历史的最后见证。例如，盖洛在考察长城时，把当时尚存的每一座烽火台都编上号，并拍下了照

---

<sup>①</sup> 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on the Yangtze*, 1903）中有119张，《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 1909）中有116张，《中国十八省府》（*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 1911）中有139张，《中国五岳》（*The Sacred 5 of China*, 1926）中有104张，共计478张，这还没有包括第三部书中解释汉字寓意的插图，如加上那些插图，总数就很接近五百幅了。

片。其中有些镜头在无论中文或是西文的其他资料中都已绝迹。再举杭州为例，从19世纪末洋人绘制的地图上，当时杭州城的城墙和10个城门、4个水门还首尾相连，相当的完整。可如今除了一个水门的局部尚存，以及武林门、凤山门、涌金门、清波门等地名还在使用之外，清末那些城墙和城楼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中文资料中，我们最多只能找到描述这些城墙、城门的片言只语，但在《中国十八省府》一书中，我们却惊喜地发现了杭州凤山门、御街和大运河上的太平桥等早已消失的历史陈迹的老照片。<sup>①</sup>它们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还原了20世纪初清末老杭州的本来面貌。盖洛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该书的百多张照片是从一千二百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盖洛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总数应该在5000张以上。

在历次考察过程中，尤其是在1909年访问中国18个省府时，盖洛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因为他身边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动辄便要撒野的赳赳武夫。无论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屈从于西方人的见解，并已经训练出大批的士兵。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包括了许多类似于西点军校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武备学堂。在每个大城市里都建起了兵营，而且往往是兵营刚刚落成，马上就住满了士兵。再也见不到弓和箭，也没有了翻跟斗和嚎叫，取而代之的是用欧洲的精确定准武器所进

---

<sup>①</sup> 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的第38—48页处共附了杭州的九张老照片。

行的系统性欧洲式操练。……整个大清帝国都在武装起来，其方式并非是心急火燎的，而是非常彻底和执着的；中国的资源是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能比拟的。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武备学堂和兵营。一路上，盖洛见到旧的贡院被拆毁，其废墟上建起的是西式的学校和大学；公共图书馆和邮局取代了旧式的藏书楼和驿站；铁路正在替代大运河作为交通干线；工厂和煤矿在全国各地出现；纸币正在开始淘汰已经用了上千年的铜钱；学生们在谈论革命、民主、自尊、公民权和改革；就连巡抚和省府衙门都在筹备议会的召开。盖洛敏锐地意识到他必须要用相机把这些历史变革的瞬间定格在他的照片之中，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和有预见性的事实”，而“事实毕竟胜于雄辩”，“事实摆在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对此加以阐释”。就这样，我们通过这位“扬基佬”的相机镜头，看到了用宝塔替代钟楼，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看到了在泰山庙宇前从相机镜头前抽身逃走的尼姑；看到了不久以后便绝迹的开封中国犹太家庭。如今，盖洛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些貌似随意的快照现已成为难能可贵的文化珍品，而它们记录的历史瞬间如今已变成了永恒。

虽然偶尔盖洛把个别地图放错了地方，但他所收集的地图都分别是当时最佳或最新版本的，其价值不言而喻。例如他所选的广州历史地图取自《羊城古钞》，而他选中的成都地图则是宣统元年三月绘制的《最新成都街市图》。其中有些地图甚至是盖洛的传教士朋友亲手绘制的，例如英国医师祝康宁 (F.H. Judd) 绘制的江西北部地图和莫泽 (I.H. Moser) 绘制的汉口地图。

上述这些插图在书中并非仅仅起点缀作用，而是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在上述图书出版之际就受到了评论家的